

热风

思想论坛

主编 王晓明

# 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文化研究对话录

孙晓忠 编

# 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文化研究对话录

孙晓忠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文化研究对话录/孙晓忠

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5

(热风·思想论坛/王晓明主编)

ISBN 978-7-5458-0291-7

I ①巨 II ①孙… III ①文化—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268 号

---

责任编辑 张王贞

技术编辑 丁多

装帧设计 张吉全

---

**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文化研究对话录

孙晓忠 编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5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180,000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291-7/G 15

定价 24.00 元

# 目 录

- 1 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  
张汝伦 戴锦华 许纪霖 汪 晖 孙 歌  
高瑞泉 袁 进 等
- 57 今日社会的文化生产——“三面向”文化现象座谈  
陶鑫良 曹锦清 贺雪峰 陈映芳 格 非 孙甘露  
薛 毅 吕新雨 等
- 81 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热风学术》研讨  
曹锦清 王鸿生 郭春林 雷启立 等
- 94 “中国电视剧”的“中国气息”  
——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电视剧(上)  
倪文尖 罗 岗 毛 尖 张炼红 等
- 104 “中国电视剧”的“时代之痛”  
——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电视剧(下)  
王晓明 毛 尖 倪 伟 雷启立 等
- 115 文学的当代性——“当代文学六十年”圆桌会议纪要  
张旭东 千野拓政 吴晓东 刘复生 等
- 153 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三十年”三人谈  
蔡 翔 罗 岗 倪文尖
- 206 美和诗意如何产生——关于一个栏目的对话  
王晓明 蔡 翔
- 228 编后记

# 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1〕

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时间：2007年6月30日

地点：图安宾馆二楼会议室

## 第一场：《读书》和最近二十年

### 中国与世界的巨变

**张汝伦(复旦大学)：**最近十年来，关于《读书》有很多说法，我想将来中国思想史可能也会去研究这个现象。在80年代，我是《读书》的作者，也是《读书》的读者。那个时代的《读书》当然是很有特色，可是那个时代在中国类似于《读书》这样的杂志，也还有上海的《书城》——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的话——《世界经济导报》、《青年论坛》等都可以算进来。可是到90年代，在我看来，《读书》就是唯一的，它对中国问题、对世界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反映的及时、迅速，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没有哪个杂志达到了《读书》的水平。这样说究竟是阿谀奉承还是客观事实，我们只要看这六本书，白纸黑字在那里。首先请这部文选的主编汪晖先生来谈一谈他自己编这套书的想法。

**汪晖(清华大学)：**非常感谢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对这套书的编选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我们很早就有编选这套书的想法了。一直以来，《读书》杂志都密切关注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

---

〔1〕 薛毅先生负责此次座谈会的会前筹备工作以及会后文字整理工作。

题的讨论散见于各期杂志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把它们综合起来。编辑部一共有六位编辑,每个人承担一本。把我们过去十年讨论、座谈等资料整理出来,每个编辑负责一个方面,各有侧重,但也互有交叉,这样总共编了六本。

我和黄平大约是从1996年参与到《读书》的编辑工作中的,到现在也有十年的时间了,这次编选这套书的过程让我们回忆起这十年编辑《读书》的历程,我们不断在想,为什么《读书》总会引发那么多的争议和争论?我觉得,中国社会在1989年以后发生了很重要的转变,早期的几年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闷的,而知识界一些表征性的重要变化,大约是从1994年、1995年开始的。在这里我举两个主要的例子,都是跟《读书》有关的,一个例子是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这是在《读书》上发生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二十一世纪》上发生的,也就是1994年到1995年期间,围绕着苏东改革、自发私有化问题,以及如何判断叶利钦改革等问题,崔之元写了《制度创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是第一次正面对苏东改革特别是叶利钦时代做出批评的文章。与此相关的,在政治经济领域里面,有关王绍光和胡鞍钢“国家能力的报告”及其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大概在1994年到1995年,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氛围里面开始的。如果我们回头来看讨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展开,有几个脉络。

一个脉络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1992年到1995年这几年,是南方讲话以后新一波市场化、城市化包括全球化的浪潮。在这个浪潮里为什么会出现包括像“人文精神讨论”这样的问题,在座的当事人都在,我就不多说了。我感觉1989年以后大家普遍觉得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够摆脱了我们原来的危机,到了90年代中期,突然觉得,如果仅仅这样单面考虑的话,问题恐怕很大,因为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新的问题不太能够简单的归咎于过去的问题。从国际的方面说,1993年俄罗斯的政治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叶利钦命令军队炮击他们的议会,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舆论里面也是完全一边倒的,认为这是捍卫民主。这也导致了民主也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究竟怎么去理解

民主？如果在两三年前，大概都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可是到了1994年、1995年的时候，随着对俄罗斯的反思，也就出现了。原先我们都知道在90年代初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把俄罗斯改革看成是中国的楷模的，觉得我们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这些危机的爆发，使得不同的分歧开始了，可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还是沿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思路来的，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参与《读书》杂志这个编辑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把这类问题提出来。这个讨论里面，比如说，从1996年开始，《读书》杂志就开始了关于乡村的讨论，关于乡村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不是从1999年开始，而是1996年10月就开始了，我们找了许多人来《读书》座谈，当初思路是模糊的，完全没有后来三农问题那样清晰的认识，但是我们只是觉得，这样一个大转变里面，这样一个生活空间，必须被挖掘出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能仅仅是过去的思维模式，所以后来我们又开辟了像“田野札记”这样的栏目，希望把乡土生活、乡村生活变成读书人思考的内容，这一部分过去几乎是没的。后来《读书》要不要发表这类文章，也有很多争论，正好在这个背景下，在1997年、1998年，中国的知识界发生很大很大的争论，所谓的——后来被说成的、我自己一直不太喜欢的说法——“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这个爆发几乎涉及所有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国际问题等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我想这是一个背景。可是那个时候的争议相对来说还是相当理论性的。大概到1999年到2000年，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界讨论的话题发生了转变，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持续不断地引发争论。

另外一个脉络，大概也是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知识界有关传统的讨论，就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学术传统思想传统，然后到了90年代中期，有关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的一些理论介绍进中国，当时我们自己在编辑过程中有一个感觉，从80年代到90年代，实际上中国知识界所形成的知识的图景是有些片面的，世界的图景也是片面的，就是过度地西方化，严格地说是过度地美国化，实际上不仅是西方，连欧洲

也不是真正了解,东欧俄罗斯更不要说了。

所以我觉得《读书》杂志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脉络,尽管不一定有很多的讨论,但是这个脉络是持续出现的。一个脉络是1996年我们开始做关于亚洲问题的讨论,把日本、韩国、中国港台地区后来扩展到菲律宾、东南亚,不断希望有一个关于中国周边地区的亚洲世界的脉络。与这个同时的是关于苏东改革的讨论。苏东改革的讨论是针对当时中国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来的,亚洲问题也是针对一个历史观的转变,我们觉得不能单方面地看待世界,因为我们过去总是说改革开放,实际上你怎么定义这个开放,最后变成把开放定义为向西方、向美国的开放,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图景是相当狭隘的,这个后果在今天也是相当清晰的,我们看年轻一代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除了对西方世界之外的大部分情况,对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甚至欧洲其实缺乏真正的了解,也就是说开放性本身也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开放,我们需不需要更进一步开放。这些问题,在当时引起过很多的讨论,因为你一旦进入这些领域,就会发现重新叙述无论是亚洲的历史还是苏东的历史等等,都有相当多的政治和经济的分歧在里面。你怎么解释历史的分歧,比如说围绕着日本问题,历史解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一旦你进入到这些领域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不断地进来,我们没有能力,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讨论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引起各种各样的分歧和争论,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围绕着这些论争,有两个要点,即关于市场与国家的表述,因为90年代以后,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很多人希望借助市场化,不仅解决当代中国经济问题而且也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但是究竟怎么来理解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90年代以后很多的辩论是围绕市场展开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其他领域的人都或多或少展开讨论,但就当时的知识状况来说,我个人觉得,对市场的讨论有相当的意识形态的倾向,你发现,左的和右的,都带有一个价值先行的倾向,对市场本身的历史分析是相当不够的,这是很明显的的一个



现象。

第二个方面对国家的分析也是这样的。90年代中期有一个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到今天,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型和变迁,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古代的问题,提到利益分化的问题,想到利益集团的问题,但作为总体的国家概念已经没有办法来描述这样复杂的国家活动了,换句话说,国家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但是国家在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经常是分裂的,不同的角度分裂,可是在知识界思考的理论上来说,也并没有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关于国家的叙述,这实际上也成为知识界产生很大纷争,然而在理论上却没有清晰化的很重要的根源,这些问题是从最基本的现实问题发展出来的,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这类问题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清理,不过大家慢慢感觉需要重新解释这类问题,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已经重新解释了这些问题。在中国90年代的情境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关于国家的争论、关于市场的争论、关于社会中的工人农民的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在里面。人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当然是在中国刚过去的巨大的危机——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的过程中出现的,因此围绕这些问题,产生出激烈的争论和分歧,变得不可避免。我们看90年代,比如1996年,我自己举几个例子,我们在《读书》杂志上关于苏东问题的讨论,那时候秦晖和金雁给《读书》写过,后来黄立佛等研究俄罗斯的一批学者也写过,而且这些争论后来都发生了很有意思的转向,不单是经济,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文化领域也在延续,比如说,那个时候,蓝英年先生给《读书》写过文章说苏联障碍主要是文学领域斯大林时代的问题,后来他的学生,在俄罗斯留学的那些学生如张洁也同样用档案来说明1989年以后的解释也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苏联时代文学的现象,而且后来也讲了在苏联改革期间许许多多的问题,这类问题不仅涉及政治经济而且涉及文化以及其他的价值领域,最终会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的历史。这些问题当然到今天,一直也是在争议之中的。

我记得是那个时候,何清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学界,那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几位经济学家在《读书》上展开相当激烈的辩论,我觉得这些辩论触及很现实的问题,这些辩论已经过去十年了,但是直到今天,这些辩论也没有终结。这些辩论理论总结的水准不能说是很高,只是在很大层面触及这个问题,可是这些争论引发的情绪上的反应,是剧烈的。所以我今天也可以提到一点,在中国知识界发生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是情绪,带着所有的情绪,坦白说,这不是一个杂志可以控制的,也不是一个杂志可以完全把握的。我希望能够同时发出两边的文章,能够产生出真正的争论,事实上,这个争论不可避免地带动情绪,回过头去想,这都很正常,如此剧烈的分化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剧烈的分化,几乎所有领域都发生争论,最后你会发现趣味情感还有历史观以及不同的历史解释方面引起的争议是真正渗透到所有领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读书》这本杂志,相对来说还是及时地反映了这样一个急剧的变迁过程,它在人们的思想和情绪上产生了的效果,所以我们希望《读书》能面对中国转变的现实,包括当代世界转变的现实并及时做出回应。

最后我回应一下张汝伦先生开头说到的争议,这些讨论,除了就贫富分化或者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产生争议,几乎所有跟这些世界有关的、也许跟我们日常生活并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问题也会发生那么剧烈的争议,这是我们过去很难想象的,比如开头所说的,关于科索沃战争,后来的“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内心深处产生那么大的冲击,这是少见的。想想那么远的战争,当然科索沃战争炸了中国大使馆,事实上,即使不炸中国使馆,那个争议也是巨大的,情感上的撞击是很大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20世纪形成的情感和后来由于危机所产生的对立,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都会爆发,而且这些爆发的过程会迅速扩展,像后来我们《读书》杂志发生的很多讨论,在海外也连续发生反应,在我们这里发表的文章,在外面会形成对中国的讨论的一个回应,所以《读书》杂志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剧变时代里面,反映出中国知识界对这类问题从不同的领域各种各样的回应方式。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读这个6本的文选,哪怕是最遥远的部分,比如回应一个人,或者孟晖编的艺术的评论,最终在里面会发现情绪的联系,这一点是我们编完这六本书,在回顾这十年编辑活动中,感觉上很深的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文选本身能从一定侧面可以提供给大家重新回顾十年中国知识界走过的很多道路,一个小小侧面,反映出一些图景。

**叶彤(北京三联书店):**这套书有两百多万字。《读书》每期大概是15万字,一年大概是180万字,十年下来就是1800万字,选出来的大概是其中的十分之一多一点。这十年,《读书》认真地做了一些事情,这6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个严肃的小结,是这十年来知识界、思想文化界共同参与的工作的成果。这次通过集中的展示,希望能给大家分析这十年的思想文化状况提供一些材料。今天,作为一个编辑,我还想打破惯例,为杂志作一点小小的解释。这十年来,对《读书》一直有一个批评,说是文章不好读、不好懂。那么这是不是《读书》近年来的新问题呢?我翻了80年代的《读书》,发现当时就有类似的批评,比如1987年第9期的编后记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很多读者谈到文章不好懂——这和我们现在对当时《读书》的印象似乎不太一致——当时的编辑部有一个态度,说是让读者坐在那儿,手边准备一部大英百科全书来读呢,还是靠在躺椅上读?可见问题一直贯穿着《读书》的始终。后来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年来的《读书》是要坐在书桌旁读的。坐着看和躺着看,当然是不同的姿态。我想,导致这一变化会有若干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和读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人统计过,1983年的时候文学类的文章在《读书》上占到了60%,到了1985年、1986年,这个趋势没有减缓,而且比重更加高;相应的,《文学评论》杂志在80年代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40万册。这既表明了《读书》当时文章分布的结构,也表明了当时《读书》背后的整个时代知识背景(和相应的读者构成)。我们阅读的时候,不可能只看一个杂志,会同时有一堆期刊或者

相关的书籍在读,这些杂志和书形成一种关系,是互相参照着阅读的,这对构成读者的知识结构是很有作用的,对读者理解新概念新知识很有帮助。80年代那个时候《读书》上发表的很多文章可以归入“新知”范畴,有很多新名词新概念,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很好读,阅读起来很愉悦。那么为什么“读不懂”的呼声不是很高呢?可以找找原因。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学界的知识结构的变化非常大。我最近看到一个学术书店2004年学术书排行榜,介绍一下:第一本《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二本《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三本《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第四本《论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第五本《仁学解释学》,第六本《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七本《转型与断裂》,第八本《“文”与日本的现代性》,第九本《朱熹的历史世界》,第十本《中国人口分析》。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了知识结构的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也有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我在《读书》杂志工作的过程中,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是能不能尽快地适应这种变化,能不能找到各个领域里反映时代变化的文章。这种内心的压力比那种发表多少文章的有形的压力要大得多,这是从编者的角度来说。在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急速变化的知识结构里面,你怎么来适应一个也在变化中的杂志,而不是单纯地从一个角度去评价它?这是读者和编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实际上编辑部内部在编稿子的时候经常讨论如何取舍,这是在这十年中一直贯穿着的,甚至在每一期都会有这个问题,甚至在每一期出样刊的时候我们都会评论这一期是“软”了还是“硬”了?是不是太“重”了?但是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要在可读性和内涵之间做出选择——这篇文章确实很好读,可是相对而言问题不是那么重要,而另一些文章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但作为“文章”来说不那么好,这就需要和作者磨合,很多的时候这个磨合的过程非常短。有时候发表出来的文章,作为一个编辑,我们承认也不是那么好看,读起来确实需要花一些工夫的。我觉得以后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作为我们编辑来讲还是要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与作者比较好地沟通这个事情。但我也希望对一本杂志要从多元的角度来评价。

**王晓明(上海大学):**从创刊的时候起,《读书》就有好几副面孔:一个是文学化的、谈文论史的、比较“文人气”的,另一个是政治性的,直接去触碰当代的思想、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比如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的名文,就鲜明地体现了后一副面孔。就我感觉来说,从开始到现在,《读书》这后一副面孔是一直没有变的。我个人记忆最深的,是1993年冬天,在座有好几位都记得吧,我们在华师大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满满一屋子人,我事先联络了沈昌文先生,他就和吴彬坐飞机来听,回去后来信,说《读书》支持这个讨论,于是就有了一连五期的关于“人文精神”的系列讨论的发表。我今天重提这件事,是要说,全国的书评类杂志,包括报纸副刊,那么多,唯独《读书》有这样全国性的声誉,最近这些年还有了国际影响,主要就是因为它有这一副面孔。不管今后谁编《读书》,如果这一副面孔没了,就是销路再大,也是失败。《读书》不是《读者》!

有人批评这十年《读书》的文章太“社会科学”了。我也有这个感觉。怎么看这个变化?还是拿我个人为例:最近十年,我给《读书》投稿不如90年代多。为什么?因为社会——国际国内的——变化太大,看不清楚。80年代,我是觉得能看清的,所以写文章比较有底气,就那么直接从文学的角度说,也敢于用较为文学化的方式说。今天不同了,原来的那一套比较清楚、简单的世界观不够用了,需要学习大量新的知识,而且是大量原来不熟悉的新的学科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写得少,或者不敢那么文学化、洋洋洒洒,也就很自然了。我个人如此,其他原来《读书》的比较文人气的作者,是不是也这样呢?从这个角度说,《读书》的文风的改变,其实是反映了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或者文科学术界的整体的思想和学术状况的变化。一本杂志的文风,能有这个代表性,恐怕也正是杂志的成功吧。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目前又处在剧烈变动的时期,如果不能有一个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讨论的空间,那是很危险的。具体到《读书》,如果这样一本靠二十多年编辑作者共同努力,已经建立起它的思想讨论

的标志性地位的杂志，竟然不能继续办下去，而被改成一本无关痛痒、小牢骚小感慨乃至风花雪月的杂志，那就太糟糕了。

**蔡翔(上海大学)：**我也是《读书》的老朋友了，我对《读书》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读书》对我的帮助很大，这十年的《读书》我也很喜欢，我也是一个办杂志出身的人，首先我也很能理解在这个十年里杂志生存的艰难，以及编辑付出的劳动。这十年，像汪晖刚才所说，是中国知识界大变动的十年，各个领域都卷入了这十年中，这十年里许多杂志刊物都介入了公共领域的讨论，《天涯》、《上海文学》，每个杂志都有自己一个不同的回应方式，我觉得在这里面《读书》是一面旗帜，《读书》这十年提供了怎么办这一类杂志的非常好的经验，我觉得办杂志最困难的是始终保持和社会紧张对话的关系，坚持一年二年可以，三年五年可以，但是要坚持十年二十年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化中间，《读书》能够始终保持和社会的对话，而且能够主动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

第二点，在这十年中，《读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它的讨论，尽管是一个对公共领域的关心，对公共问题的关心，采用了一个专业的风格，它的讨论更多地是集中在一个知识的层面，不能说80年代没有讨论，但很多讨论是在一个情感的状态下面，《读书》在这样一个讨论的过程中能够转向知识层面的讨论，而且提供了各种知识和各种专业背景，这是我读《读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和启示，而且我也希望今后的《读书》能够继续朝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不停留在情感和道德的层面上，这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传统，《读书》是形成了一个知识层面、思想层面的更加深入的传统，如果这样一个发展变化导致了刚才诸位所说的读得懂读不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用“好看”来要求《读书》这太低了，现在讨论好看不好看不仅仅是一个文体上的争论，当然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针对《读书》来的，前几年我在《上海文学》的时候，对《上海文学》也有这样的批评，当年北京有个著名作家找我们作协领导谈话，他也说《上海文学》许多文章看不懂，然后我们领导找我谈话，说这很简单，当年他

的小说也看不懂。这不成为一个问题。

**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我是《读书》的老作者,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忠实的读者,我认为刚才晓明对《读书》两个阶段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80年代的《读书》和近十年的《读书》,我认为也不完全是时间的问题,80年代《读书》是专家和学者写给热心于这个问题的外行看的,1996年以后的《读书》可能更多地是专家写给专家和近乎专家看的。另外一个差别,我感觉80年代的《读书》,编者和读者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紧张的关系,编者常常其实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缘行走,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刚才晓明说了,可能那个时候市场比较简单,尽管变动也在开始,但是通常这些专家可能对自己的文化方向或者我们的时代没有很多的困惑,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目标很清楚,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是90年代,像汪晖说的,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今天的讨论会特别好,那天晓明和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参加一个中国哲学的会议,他们要我做一个讲演,我想来想去想了一个题目:哲学史研究和时代意识。什么意思呢,我也就是觉得现在对时代的认识成为时代的问题,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你在往前推,20年代中国是剧变的时代,30年代也是剧变的时代,40年代的中国也是巨变的时代,当然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已经走进新时代了,我们觉得没问题了,我前段时间看《观察》,《观察》有个人写了篇小文章,他讲时代,用了十几个名词,他没办法用一个统一的名词。对这个时代的认识真的可能是我们时代的困惑,我在一次讲演中讲到,中国哲学研究现在完全失去了对时代的把握,可能是知识的背景,可能作为个人的修身养性,但它就没有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我觉得《读书》在这十年做了很好的工作,确实是触摸那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其实对这个时代的认识一定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渐渐提升的。我希望《读书》的工作以后继续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我和刚才的说法有点不一样。对我来说80年代的《读书》蛮难读的,我觉得90年代的《读书》更容易,当前流行的

说法是《读书》前后有断裂,我看《读书》却有一定的延续性,当然是有变化,我不知道有人做过统计资料没有,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学术上的新名词,大多是80年代初《读书》发明的。那个时候我在《读书》里就读到很多新的东西,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他们谈“20世纪中国文学”里面好多词啊,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理工科学生,求知欲特别强,什么能指、所指,共时性、历时性,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的特别少,大家读不懂的东西,特别愿意去追究,然后就读得很有快感。到90年代我觉得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听到新的东西太多了,懒得去理,懒得去追究,不像80年代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特别新鲜,到90年代留学回来以后,因受过训练,读它的文章,我觉得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它的观点,是不是有分歧,但我觉得特别明晰,整个论证的展开、问题对我来说更有效。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会说90年代的难读,可能到90年代,《读书》没办法用一种当时80年代文人式的、一半在介绍知识、一半在谈问题那样一个方式来展开。另外,由于问题那么复杂,所以如果要变得有效的話,一定要借助很多理论资源,但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通俗层面能够谈问题,这样,《读书》就变成一个——我相信这不是主编的意图——文人圈子,或者说同行写给同行看的東西,这样在中国共同话语间出现了一个断层,在大家能读得懂的,一般的知识大众那里,还是用一些常规的未经反思的概念,但是深入的谈话就变得要非常的专业化,但是当中的断层没有解决,所以大众的反应读不懂是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面对一个小团体的自说自话,我们在理论的有效性和复杂性之间,怎么样做一个取舍,我觉得这是《读书》面临的考验,我觉得可能,80年代能够感知到的问题相对简单,容易用一个好像专业说给外行的方式谈,但是90年代,这个方法不再有效了,这个有效性对专业人士是有效的,对知识大众来说他会有他的问题。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我是读《读书》长大的。这里我和张汝伦老师稍微抬个杠,他刚才讲80年代的《读书》不是唯一的,我想说80年代的《读书》也是唯一的。为什么呢,在80年代,大家的眼界和世界总



体来说是比较单一的,所以现实也是比较整一的,所以知识界也是能够统合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80年代的《读书》统合了各种各样的资源,表现出一种态度的、立场的、观念的甚至是文风的多元的统一性,也就是晓明老师刚才讲的几副面孔,包括对社会思想现实的介入,所有这一切都还能够整合在一起。但是我同意张汝伦老师后半句话,90年代以来或者新世纪后《读书》更加是唯一的,80年代之后因为现实发生了剧变,知识界其实也开始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现实立场和趣味,应该承认,《读书》到了最近一些年来其实已经分出了若干种杂志,它的功能已经由很多不同的杂志分别承担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说,现在的《读书》、这十年的《读书》可能是更加唯一的。现在是一个消费娱乐的时代,我甚至可以讲80年代的《读书》具有锐气的文人气的东西,到了现在没有了,今天有了某些负面的东西,可能在某些刊物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读书》不必或者不必太多过于追求这一点。你想回到80年代中后期的《读书》一统天下的时代,我个人觉得其实也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深刻的介入到中国的甚至可以说全球,这些年来的《读书》国际化视野越来越明显,我觉得这样一种追求的杂志在中国不是太多,是太少,这些年来的《读书》更加是唯一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其次,如果说《读书》暴露出怎样的问题和困境的话,其实也是中国当下的问题和困境,同时更是知识界的现实和困境。比如一个所谓文学艺术的比重下降的问题,这个其实是90年代初很多敏锐的人,比如说蔡翔老师一直在讲,80年代是文史哲和心理学比较勃兴的,到了90年代有一个社会科学化的问题,整个的社会学经济学的一些学科开始成为一个主导性的学科,因为90年代以后中国世界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必须以知识化的讨论才能够应对,如果有知识化的训练的话,反而觉得这样的文章是有来路的,是有学理的脉络的,反而是容易把握的。另外一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要对《读书》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对中国知识界面对现实回应现实的能力提